

對於激進主義的反思

劉述先

原始儒家思想之中，並不是無條件地支持家天下的現實統治。當前有關激進主義的爭論之中，現在回過頭去空想革命不發生如何如何，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我們所要棄絕的是毛式罔顧現實的激進主義；另一方面，當政者不應該無條件地壓制激進思想，因它的產生絕非無因而起。

儒家一向被認為持保守主義、改良主義的觀點，這自有一定的理據，孔子就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類的話。但孔子對於古代遺留下來的傳統並不是沒有揀擇的。就三代來說，孔子明白地選擇了周代，所謂「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繼承了孔子為己之學、克己復禮為仁、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並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主張仁義內在，性由心顯，盡心知性以知天。在政治上，他繼承的是《書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民為貴的傳統。堯舜才是孔孟的理想，家天下是因應現實情勢所作的實際安排，到了桀紂一類的暴君當道，人民就有革命的權利。由此可見，先秦儒家雖然強調要建立上下尊卑、有禮可以遵循的穩定社會秩序，但同樣強調暴君肆虐、社會失序，驅使人民到了無可忍受的地步，就可以無保留地支持湯武革命、弔民伐罪的行為。如此原始儒家思想之中清楚地既包含了現實主義又包含了激進主義的成分，並不是無條件地支持家天下的現實統治。從這個角度看，《春秋》的張三世，《禮運·大同篇》在小康之上還要提出大同世界的嚮往，《大學》講修齊治平，這些的確是儒家的思想。歷代的質疑並沒有提出充分的論據證明這些不是儒家的文獻，只是指陳了一項事實：在儒家思想發展的過程中，博採了道家、法家、陰陽家、乃至雜家的成分。但只要其指導精神仍是儒家「人文化成」的理想，那就不能不說它們是儒家的典籍。有些論辯橫生枝節，見樹而不見林，看不到先秦儒、宋明儒、以至當代新儒學的各逞異彩背後的一脈相承的線索，不免令人感到遺憾。

由最近出土的材料之中，也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既努力保存傳統又勇於不斷創新的基本性格。帛書《易》的發現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研究的資糧。它的《易傳》包含了一些與今本相似而不全相同的材料，如《繫辭》，但也有幾篇不同的材料，其中最關緊要的一篇是〈要〉。根據廖名春的研究^①，〈要〉是摘要的意思，

裏面抄摘下來最重要的一段文字即孔子與子貢(貢)的對話。大概子貢對孔子晚而好《易》的傾向表示質疑，孔子十分耐心地加以答覆。大意是說，《易》是保存古代材料最多的一部典籍，包含了不少合理性的因素，它的吸引力並不在占卜迷信的部分。這與《左傳》、《國語》、《史記》記載孔子與《易》的關係的材料差不多是完全吻合的。這說明傳統謂孔子作十翼的說法雖不免過分誇大，卻並非完全無稽，幾乎可以確定孔子是《易傳》作者之一，只不過我們不能指明，那些是孔子本人所說，那些是孔門後學傳留下來的東西罷了。由此可見，完全限制在《論語》的材料範圍以內談孔子的思想是不足夠的。至少《易傳》之內確包含了許多孔子以及孔門後學發展出來的思想，是可以斷言的。

秦漢大一統，在儒家思想的發展上造成了巨大的折曲。一方面儒家的一些價值如忠孝、制度如禮教得以落實，另一方面政治化的儒家演變成爲帝國的意識，乃展現了一些完全不同的面相。由封建而郡縣，春秋「興滅國，繼絕世」的精神已無法繼續下去了。而孔孟的正名思想也變質成爲源出於韓非的綱常思想，由上而下的權威主義取代了上下雙向互動的開放架構。在漢代，建立了考試制度與宰相制度，還具備有開明君主制的規模。到了明清，科舉制度演變成爲八股，宰相制度則受到破壞，再加上文字獄，專制傾向日甚。這種僵固的傳統規模終於抵擋不住時代潮流的侵襲，隨着朝廷日子的逝去而終結了。

宋代儒學，一方面抵拒五代道德淪喪的衰風，另一方面應付外來佛教的挑戰，而打開了中國哲學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宋儒繼承了孔孟的睿識，發展了整套的天道論與心性論的觀念，重新把道德理想與文化精神提了上去。朱熹頌揚三代，貶抑漢唐，對現實的政治化的儒家有所制衡。但他並沒有把超越理想化爲激進主義的行動力量，宋儒的落實是通過教育文化的推展。佛教的輸入不只沒有破壞傳統文化的基礎，恰正相反，中國人的綜合心靈傾向於三教合一，反而顯發了傳統的凝固力。一直到現代西風東漸，這才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激進主義思想在這種新的情勢之下，才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力。

這就把我們帶進到當前有關激進主義的爭論之中。李澤厚最近幾次三番說，他反對激進主義：他認爲辛亥革命的發生是偶然的，如果中國沒有革命，走改良的道路，情況可能會好得多。李澤厚持這樣的觀點當然有他的理由，但他的推論太過，我不能同意這樣的見解。我承認歷史事件的發生有許多偶然的因素，辛亥革命的確並沒有必然性。然而當時大勢所趨，我看不出清廷繼續統治下去的可能性。李澤厚欣賞康梁的改良主義，這不是問題。如果清廷真能下決心走向改良的道路，也許的確可能產生一個完全不同的局面。但不要忘記，連革命黨孫文原來也是改良派，他曾上書李鴻章條陳自己的見解。但改良根本沒有希望，人們的挫折感越來越深，終於才下定決心走革命的道路。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先秦儒家肯定革命的權利是完全合轍的：更何況清廷是異族統治，情況與英國、日本完全不同，事實上既已證明爲腐敗無能，根本就缺乏繼續統治下去的合法性。故孫中山原來的口號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後來才改口爲「五族共和」，這顯示了他的智慧。我在南伊大時曾聽過賽珍珠演講，她也認爲如果中國能保持君主立憲，就不會有日後的亂局。她不明白，清廷的君主根本不能像英日的皇室那樣在中國發生積極正面的象徵性作用。清廷的繼續統

治、袁世凱的恢復帝制，就當時的大勢看來，乃不可能的事。此所以一生信奉改良的梁啟超也終於反對復辟，肯定民主共和，最終與康有為分道揚鑣。現在回過頭去空想革命不發生如何如何，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

同樣的論辯也適用於國共的鬥爭之上，現在看到台灣的小康局面，比對於經歷文革的大陸，很容易讓人有一種想法：如果共產黨不推翻國民黨，讓它在大陸繼續統治下去，情況豈不是好得多。我認為這同樣是不切實際的空想。不要忘記，毛澤東在年輕時也曾經是改良派，崇拜過曾國藩，佩服過康梁以及孫中山，後來才變成激進的革命派。如果國民黨在當年實行三民主義，那根本就不會失去大陸，被趕到台灣去。不幸的是當時實行的其實是二民主義，政府貪污腐敗，專一搜刮民脂民膏，豪門肆虐，罔顧百姓死活。我那時還只是個十來歲的青年，親眼目睹大家把辛苦積蓄的一點金銀，排隊到銀行去換取不久就變得不值一文的紙幣。中學生都在高談闊論必須徹底改革，這樣的政府還能維持下去嗎？故此長江天險，共產黨竟然不費吹灰之力渡過。國民黨是在被逼撤退到台灣之後，痛下決心改革，實行三七五減租，財經掛帥，又適逢韓戰，這才得以苟延殘喘，後來重新打開一個局面。但空想國民黨繼續留在大陸如何如何，同樣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通則：正是因為改良不力，挫折感日深遂成為培養激進思想的溫牀，終於大勢所趨，不可逆轉，於是開展出一個新的局面、新的時代。共產黨在大陸的成功恰正是這一通則的實現。但毛澤東的激進思想卻展示了一些新的面相，值得我們注視。他的問題在於：他那麼熟悉中國歷史，卻偏不領受歷史的教訓，於是遺害無窮。傳統在打下天下之後，必經過一段與民休息的階段，然後才能有條件開創一個大有為的局面。然而毛澤東卻摒棄儒家的現實智慧，由五斗米道那裏吸取了吃飯不要錢的烏托邦思想。他自己當國，卻失去了改良的耐性，很快放棄了自己的新民主主義，設置人民公社，搞土法煉鋼，發動文革，終於把中國帶上了空前未有的動亂與災禍。文革以後撥亂反正，這才把中國帶回，努力走向一個小康局面的道路。

總結以上的觀察，我們所要棄絕的是毛式罔顧現實的激進主義，而不是毫無保留地譴責所有的激進主義。我們固然不要毛那樣的獨夫，必須建立民主法治的架構，才能避免像文革那樣的災禍。但另一方面，在上面的當政者決不應該無條件地壓制激進思想，因它的產生是由於長期積累的挫折感所醞釀出來的，絕非無因而起。如果當政者不取有效的方法努力從事改良的實務，只是不斷說一些漂亮的空話，壓制持異議份子的言論，那麼未來會怎麼樣？歷史有那麼多難以控制的變數，那就不是任何人所可以預料的了。

註釋

- ① 廖名春：〈帛書釋《要》〉，《中華文化》，第10期（1994.8），頁63-76。